

论目录学的功能体系

陈 传 夫



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目录学家对目录学功用的认识是不同的。目录学的功用是评价目录学体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指标。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将中国传统目录学功能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福开森在《目录学概论》^①中将目录学功能归纳为“描述文献”。这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外目录学家。目录学的功能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而且影响其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从历史发展上,将影响目录学功能的各要素联系起来作一比较考察。(见下表)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目录学的功能与理论体系的核心存在着联系,即功能体现目录学的核心。例如宋代郑樵以类例、学术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理论其功用是“分类例、明学术”。

目录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与功用之间存在着联系,即体系的起点决定了功用的特点。例如章学诚以学术为起点,为了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就采用“互著”、“别裁”之法。因为文献中的内容(学术)有时是交叉的,必须深入到文献的内容中去才能达到目录学的原有目的。爱贝尔特以“目录”为起点,决定了他通过对“文献的汇总”来记录图书和进行评价。谢拉以“知识”为起点,决定了他通过书目通讯这一手段来实现知识交流。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对功能有决定作用。如郑樵“会通”的历史哲学思想决定了他要从总天下之书为一书的要求上对宋代以前的学术进行汇总。他总的历史哲学也是他建立目录学的基础。谢拉十分强调“社会认识论”,决定了他通过研究“知识”、“社会”与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来探索实现这一功能的方法。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目录学具有不同的功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的发展上看出。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术争鸣的时期。这一时期大约在公元前476年开始,正与古希腊目录学萌芽时期相同。这一时期西方目录学的功能仅仅表现为书目的功能——“图书的抄写”。



目录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现代系统思想为我们探求目录学体系的功能提供了认识的方法。现代目录学体系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是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体系。目录学的功能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第一,指导书目事业建设的功能。书目工作在它的萌芽时期,以个体的、手工作业为主,不能算作书目事业。十九世纪以来,书目事业走向了协作和联合,迫切要求将书目事业作为单独的一个社会事业来研究。目录学体系的全部内容都是对书目事业的运动规律(即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总称)的概括和总结。^②书目工作(事业)是目录学原理的实践来源和检验尺度。

目录学是怎样发挥这一功能的呢?

1. 总结书目事业的经验。书目事业有自身的结构和运动规律,但它受社会环境的制约。由于这种矛盾运动,使目录学发展出现不平衡。建国以来书目事业发展过程表明,在一定历史时期书目事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目录学理论就是及时总结书目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发现运动规律,指导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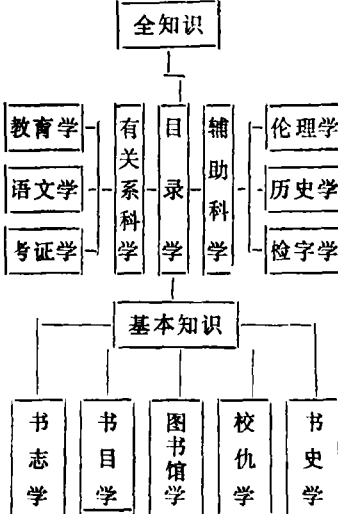
2. 为书目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书目事业是各类型书目情报活动的更高层次的概括。目录学总结各类型书目情报运动规律,并对这些规律加以系统化,成为书目事业的发展准则。目录学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书目事业的历史规律,以指导未来。目录学的发展研究原理为书目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导。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从各种事业、各国事业比较的角度,找出书目事业发展的共同准则。

比较的国家 (时期)	比较的人物、 流派	比较要素	理论出发点或体系的起点	理论基础	理论水平(著作或书目)、 体系结构或核心内容	目录的功能、 目录学的功能或目录学体系的功能
十七世纪以前	中国(春秋战国—汉初) (公元前476—公元初)	孔子—刘向 (前551—前479)(前77—前6)	书的内容	儒家思想	我国目录学奠基时期。《诗》《书》之序,《别录》之作。	“言其作意” “撮其旨意” “别集众录”
	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初)	卡利马赫 (kallimachos)	图书、 目录		萌芽时期。《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一览表》等。	“书的抄写” (Writting of books)
	中国(宋·12世纪)	郑樵(1104—1162)	学术	会通	《通志·校仇略》。以类例、学术为中心。原理:编次必谨类例论、编次必记亡书论、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泛释无义论、书有不应释论、书有应释论、不类书而类人论。	分类例、明学术
	俄国(11世纪)		图书		萌芽时期。早期文献是《斯维亚托斯拉夫文集》	图书的记录
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末	中国(清18世纪)	章学诚(1738—1801)	学术	道不离器 (哲学) 六经皆史 (史学)	《校仇通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中心。原理:“原道”篇、“宗刘”篇、互著、别裁、辨嫌名、补郑、校讎条理、著录残逸、藏书。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法国(18世纪至19世纪)	夏尔·穆泰等 (charles mortet)	图书		18世纪中叶,目录学被认为是古文书学家的科学,史学的分支。1789年,有人认为是图书的科学(science of books)。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有人认为目录学是一门同时论及图书馆学、藏书学、图书生产的技术方面、纯粹目录学,甚至古文书学、图书馆史和文献校勘的学问。 Charles mortet 认为目录学包含三个方面: 目录学 1. 情报及其研究的主要手段 2. 区别自古至20世纪各种图书的特征与基本要素 3. 图书馆学各个技术方面	“关于书的写作” (Writting about books)
	俄国(18—19世纪)	索必科夫 (B. C. CO-ПИКОЗ) (1765—1818)	书中的知识		《俄罗斯书目的经验》。关于书中的丰富知识是目录学对象。目录学是国民教育史的组成部分。	评价图书(启发读者阅读兴趣和帮助读者选择图书)
	德国(18—19世纪)	爱贝尔特 (Ebert Fr. Ad.) (1791—1834)	目录		《普通目录学辞典》(原文在爱尔斯施[Ersch J. S]和格鲁贝尔[Gruher. J. G]《百科全书》上)。将目录学分为“纯粹的”和“应用的”两部分。	书的总汇;纯粹目录学。书的评价:应用目录学。

3. 对书目事业进行评价。目录学通过研究书目事业的一般规律,制定相应的书目事业功能目标。这些目标是衡量事业发展的尺度。目录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它可用来解释书目事业中的现象,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作为自己体系研究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目录学发挥评价的功能的手段是多样的,但它离不开具体的书目情报活动。评价的中介是“书目情报”。

(续上表)

比较的 国家 (时期)	比较的 人物、 流派	比较 要素	理论出 发点或 体系的 起 点	理论基础	理论水平(著作或书目)、 体系结构或核心内容	目录的功能、 目录学的功 能或目录学 体系的功能
二 十 世 纪 以 来	中 国	姚名达(1905—1942)	目 录		《目录学》 	剖析条流 以为纲纪
	中 国	黎锦熙(1890—1978)	文 献		《新目录学及“类码法”之扩大应用》(1941)。世界化、现代化、科学化、工业化。用类码法控制宇宙之一切文献。即“四化一元”制。	读书指导 图书管理
	美 国	谢拉(J. H. Siera)(1903—1982)	知 识	“社会认识论”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记录知识产品的生产—传递—利用体系。	知识通讯
	苏 联	科尔舒诺夫(当代)	目 录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目录学普通教程》。关于图书的科学。核心是研究“文献与需求者”。	书目情报交流、读书指导
	中 国	北大、武大(当代)	同 上	同 上	《目录学概论》。以“揭示与报导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为核心。论、史、法三部分。	读书入门之学 科研指南
	苏 联	列宁格勒学派(当代)	情 报	同 上	目录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是社会情报学的三个分支。	情报交流
	美 国	芝加哥学派(当代)	知 识	社会学	《目录学的理论基础》、《知识组织》等。记录知识的生产—传递—利用体系。	知识通讯

第二, 促进知识交流的功能。文献在知识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知识增长与文献增长有着密切联系。“知识的增长可以意指文献的增长, 即某一领域出版物数量的增长, 或者指情报增长, 即该领域新理论数量的增长。”③书目等二次文献的处理对象是记录下来的那部分知识。书目情报的生产——传递——利用是目录学理论体系的实践来源。书目情报对知识交流作用机制是:

1. 情报报道。及时通报新出版图书、杂志、其它资料的内容。这一点, 可以举“国家书目”和“文摘杂志”为例说明。国家书目是一个国家出版物的目录总汇, 起着全面揭示报道的作用。世界上的现行国家书目

如英国的《英国国家书目》、德国的《德国书目》、苏联的《图书年鉴》，这些书目以法律规定的呈缴本为基础，接收并及时报道本国的全部出版物。我国的《全国新书目》和《全国总书目》是现行国家书目，报道全国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图书、乐谱、地图等资料。

2. 情报检索。利用二次文献，查出与自己课题有关或相对有用的那部分文献，并且要求检索迅速、准确、全面。情报检索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是事实的、数据的、文献的检索。检索的要求可以是一个类、一个主题，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某一作者的文献。从中找出相应的数据、事实等知识。书目情报是一种浓缩的一次知识的记录，可部分地代替一次知识的作用。

这种情报特别在语言障碍、地理障碍而无法获得原文的情况下，知识交流的作用体现得更加明显。除此以外，书目情报提高知识传递的速度和扩大传递范围，还提供文献来源(原文出处、馆藏地址)，帮助确定文献的价值、确定文献的相关性，避免阅读无关紧要的原文，节省时间。

第三，对文献记载的知识进行评价的功能。目录学不仅研究宏观书目事业的运动规律，而且研究微观的方面，对文献的内容特征进行评价，以达到提供更多的启发信息的目的。这是目录学特有的功能。目前，在书目实践中社会科学文献内容评价工作开展较好。社会科学文献的一些内容具有思想性或体现编著者的思想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的书目实践活动、文化学说为目录学发挥这一职能奠定了基础。目录学研究文献内容评价的普遍适用的方法。例如图书揭示的原则、方法、推荐的方法等。

目录学这一功能主要应用在三个方面。

1. 应用于学术研究，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我国目录学从它产生之时就以讲究学术源流形成自己的优良传统。孔子整理《诗》、《书》之序，《别录》的“辑略”及后来各代书目中的大序是“讨论群书之旨”，小序叙述一书一家之源流。同时还考证作者生平事迹、版本流传、真伪、史料价值，这种学术史的工作，清代学者章学诚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体系。目录学这一功能正是文史学家所要求的功能。他们认为书目就是要明学术之史。所以近来出版的文史著作(如史学史、史科学、史学概论)均举目录学为讲授内容。

2. 应用于图书文献管理。三十年代，我国曾有一派目录学家对流略之学极为不满，西学东渐，图书馆蜂起，要求传统目录学革新以“方便稽检”。实际上我国目录学从一开始就有文献管理的职能。例如殷商时代的甲骨编码，目的是为了史官方便管理。汉初开始了正式的图书登记工作。1941年，黎锦熙提出了“整理控制宇宙之一切，不以图书为限”^④的世界书目控制设想。建国以后，我国开始了在法律保障下的图书登记工作。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书目控制(UBC)思想流行起来，UNESCO认为要“控制与掌握书目所提供的人类已出版的文献，达到书目原有的目的。”^⑤

目录学理论应用到图书馆、文献工作中心、书目中心、情报所、档案馆、出版发行单位，成为图书文献管理的手段。例如在图书馆，文献采编系统利用书目了解文献源，查对馆藏、订购、分编等等。图书馆书目工作出现了集中化、协作化、网络化的趋势，更迫切要求目录学理论指导。

由此看来，图书馆工作者与文史工作者对目录要求不一样。图书馆工作者主要从方法上要求书目评价图书，为图书情报工作提供依据。例如AIA编制《中学图书馆书目》，专供图书馆选择图书之用。

3. 应用于文化教育。阅读仍是人们获得知识和进行教育的重要途径。由于现代文献的特点，造成了阅读的困难。黎锦熙认为，“我国目录学之功用，首呈现于读书指导，”并认为《别录》就是为帝王做读书指导用的。可见人们对这功能的重视了。我国目录学长期以来形成了重读书指导的特征。目录学成为研究“读书入门之学”。^⑥近一个世纪以来，目录学日益与教育学相联系，目录成为教育的手段之一。姚名达说：“图书馆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在研究目录学中，应随时注意到教育、着重教育。”

解放后，党十分重视利用书目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例如1953年中央发布《关于1953—1954年干部理论教育的指示》，其中确定了全党干部应该学习的列宁、斯大林等人著作目录。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二中全会公布了《整党学习文件目录》。近几年，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解放军总政治部都发起了读书活动。目录学的原理发挥着指导阅读的作用。

第四，对目录学知识的整体综合功能。

1. 对目录学知识体系化的功能

目录学体系是由概念、原理、学科结构、范畴组成的一个功能整体。这些概念、原理、结构范畴本身

具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价值,例如“书目情报”、“书目”、“目录学对象”这些概念……书目情报生产——传递——应用原理……目录学概论、目录学分支……。而且它们只有相互联系、影响的时候才构成理论的体系。目录学体系对目录学知识体系化的涵义是:将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目录工作知识(技术、方法、规范、理论等)加以组织,使这些知识在目录学核心内容的周围形成一个集合,这个集合体在整体上发挥更大的功能,并通过内部的结构调整,向科学理论化方向进化。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目录学体系发挥这一功能的机理:

首先,表现在从理论进化的角度,将目录学的原知识进行综合,然后形成目录学的理论命题。早期只有书目的零碎知识,如在中国的殷商时代,出现了甲骨文献排列的现象,“并产生了简单的著录文献的目录”。^⑦这是胚胎时期。在古希腊,“目录学”这个词萌芽于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三世纪出现了目录的雏形。自卡利马赫后,克劳德·加伦、思克斯·冈纳狄等人的著作都是对某一地方或时间中的人物的著述的编目。早期的目录学思想还很简单,就是“图书的抄写”,没有体系化。

公元前一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了大型的系统化的书目著作。刘向、刘歆在编制《别录》、《七略》时,创立了“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相互补充、除去重复、条例篇章、定著目次,校勘讹文脱简,命定书名”^⑧等一系列校书的方法和“每一书已,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⑨编目方法,但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阐述,只是到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序》中加以总结了。《隋志·序》又“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志》,摭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⑩从理论上指导了《隋志》的编制工作,并论述了图书文献的起源和社会作用,图书与学术的关系,编目的方法,这是体系化的尝试。十二世纪的郑樵在“会通”的历史哲学思想指导下,通过《七略》“编书之次”的研究,总结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类例思想;通过《七志》亡书志的研究提出了“编次必记亡书论”的思想;通过对求书之官“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唐)“苗发等使江淮搜书”,史官司马迁、校书官刘向父子,及后来的虞世南、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的校书经历的考察总结,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的思想;通过对《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崇文总目》“每书之下,必著说焉”的得失总结,提出了“泛释无义论”的思想。郑樵通过对前人书目工作经验的总结与系统化,形成《通志·校雠略》^⑪这一著作,这是我国目录学史上最早的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

国外,十七世纪以来,“目录学”的含义转变为“关于书的写作”(Writting about books)。但理论体系出现较晚。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目录学家将目录学理论综合为两个分支:列举的和评论的。

中外目录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说明了这一机理。目录学知识的积累呈现出这种状态:先行书目情报实践活动,然后才有目录学理论原理。书目情报在这种进化状态中,成为一个中介点。一方面它作为实践的结晶,成为对实践的说明;另一方面,书目情报中凝结着文献工作者实践活动的价值,成为认识、评价、总结实践活动原理的起点。

如果我们将“现在”看作是“历史”的横向扩大,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当代目录学理论的进化也要经过经验知识阶段向理论科学时期的过渡。在历史上,早期的目录学知识理论系统化,成为古典目录学体系。当代,目录学知识与信息科学相结合渗透到一切文献记录知识处理领域。在以记录知识为主要工作对象的科学与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出现新的书目情报工作的方法、技术、成果。这些知识的发明有时是偶然的,知识元素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例如科学史学家普赖斯发现了科学文献增长与时间之间的函数关系 $F(t) = ae^{bt}$, 即指数增长律,通过统计,人们又发现了文献的老化与时间的函数关系。巴尔顿和凯普勒描述为 $Y = 1 - \left(\frac{a}{e^x} + \frac{b}{e^{2x}} \right)$, 即文献衰老的负指数律。文献的这些规律的认识丰富了目录学理论。文献的增长曲线和半衰曲线的发现,标志着对文献研究的知识的深化,但是,对增长和老化时间若作静态的考察,就难以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对他们进行体系化,揭示出两个定理各自的功能、局限性,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将揭示出目录学体系中的另一对范畴。

其次,目录学体系与多种学科体系相交叉,形成其它学科的研究内容,目录学体系重新建立起这些知识之间的联系。

图书馆学与目录学几乎同时诞生,具有血缘关系。最早确立图书馆学体系的国家是德国,施雷廷格第一次建立了这个体系,即“施氏体系”,构成这个体系的主体部分是“图书的配置与目录的编制”。十八至十九世

纪德国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F·A·爱贝尔特提出目录学分为记述(纯粹的目录学)、评价(应用的目录学)两部分的见解,并又创立了图书馆学体系(后人称“爱贝尔特——默尔贝希体系”),目录学与图书馆学体系有交叉的地方。1928年莱丁格提出了图书馆学包括图书学、目录学、图书馆史、图书馆管理“四重性”概念。情报学在二次大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目录学中情报概念的确立,使目录学知识与情报学知识相互交叉的形式多样化,例如美国的“Seracevic 理论体系”中包括文献计量学,苏联米哈依洛夫的理论体系把情报学与社会联系起来,以科学交流为对象。他认为“图书-书目交流”是正式的科学交流渠道,并同意科尔舒诺夫的意见,将书目情报作为情报的第三层次来研究。

图书馆学、情报学体系的进化,以对目录学等学科的应用为基础。并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完善了相应的体系。图书馆目录工作、文献检索是目录学研究范围的一部分,但近几年来却随着图书馆学体系的螺旋式上升扩大的趋势及情报学体系的综合化使它们在更多的接口上与相应的学科体系发生交叉关系。科学体系的这种发展特征要求有一种理论体系把这些分散在各门学科体系中的知识组成一个整体。目前与目录学相交的学科还有史科学,例如《史科学概论·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流派》(谢国桢著),历史科学,例如《史学概论·文献目录学》(白寿彝主编);版本学,如钱基博的《版本通义》,校雠学,如蒋伯潜的《校雠目录学纂要》;史学史,如金毓衡的《中国史学史》,文献学,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辑要》。此外古籍整理,经学、传播学、新闻学、出版学中均有目录学知识。这些目录学知识都带有特定的学科特色,只有综合这些特色,将这些零碎的知识进行理论的体系化,才能更好发挥这些知识的功能,使目录学理论具有更强的适应各学科要求的能力,加深理论的层次。

若从宏观的角度,目录学可以划分为以中国古典目录学为基因的东方目录学体系,和以古希腊目录学为基因的西方目录学体系。各流派的目录学核心不同,因而建立了各种不同特征的理论体系。目录学体系的功能之一是将这些不同流派的目录学理论看作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又都有自己的“内核”。这些“内核”代表了某一理论体系的特征及研究的侧重点与方法,在某一领域内,目录学家必须遵循共同的准则。目录学体系将这些内核看成自己内核的一部分,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书目情报交流”。内核的本质是“知识通讯”。

书目情报交流是任何类型书目工作的本质,各个流派的目录学内核可看作书目情报交流的不同形式的变通。例如“关于书的抄写”的理论内核是关于文献形式信息的交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派的内核可看作是关于文献中学术内容的交流。

再次,整体综合功能使目录学克服了科学分化造成的局限性,在体系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综合,确立了目录学的学科地位。

清代以前的中国目录学是一门结构单一的学科,有人称之为历史的辅助科学。但近一个世纪以来,书目情报工作的一些技术和方法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例如研究索引的技术、理论、属性,构成“索引法”或“索引学”。这样的专门研究领域有文献学、索引学,标题学、目录分类学、文献检索、著录法、提要法、考证学等。目录学与有关方法学科相结合分化出一些边缘学科,例如书目计量学;目录学与有关专业结合,产生专科学目学,例如文学文献目录学。目录学学科分化客观上造成了目录学发展的不平衡。各个研究领域交叉、重复,有时还缺少应有的联系。分支学科被认为是相应学科的分支,构成相应学科体系的一部分。目录学成为对这些领域协调的机制,使被人为割裂开来的各部分重新建立逻辑上的联系。

克服研究体系分化造成的局限性,使目录学研究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历史的发展和书目情报实践的要求,使目前目录学形成了四个相应的研究分域:基础的、应用的、发展的、比较的,国外称作科学的(as a Science)、工艺的(as an art)、产品的(as the products)等几部分。科学研究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目的与功能。基础研究着重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书目情报的各个方面;应用研究则注重于方法论;而发展研究则着眼于转化;比较研究则是跨学科、空间的综合研究。科学研究的这种划分也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科学的整体性。科学体系将这三个分域合理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研究体系,协调各研究领域,便于合理地投放研究力量。

2. 对目录学知识整体性预测的功能

目录学体系作为对目录学的各部分知识的概括,具有宏观描述的功能。各种概念、原理在体系中显示了

不同的地位。目录学体系根据外部环境对体系的反馈信息,预测目录学体系各部分的未来发展。

首先,目录学知识生长的预测。目录学体系是目录学各种概念原理以线型、平行、交叉型等形式构成的结构显示出来的。它本身除具有学术性外,还有对知识预测的功能。概念和原理是目录学的基本要素。目录学的最初知识的结晶是概念和原理,目录学体系研究体系的起点,概念、原理形成的条件和途径,预测未来概念、原理的形成。中国古典目录学以学术和书目为概念的起点,由此生成一系列概念,这个概念系统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逐步扩大。概念之间通过一定的形式联系成为科学体系之网上的“网结”。信息技术为目录工作原理的应用创造了条件。随着认识的深入,科技的发展,目录学知识将逐步加深层次。

科学体系还预测目录学的分支学科,因为分支学科的生成机制正是体系研究的范畴之一。例如两门学科之间生成目录学分支学科的原理可以预测,随着各门学科知识量的增加,目录学知识与具体学科知识的相互作用,将生成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体系的目录学分支。例如经济目录学、哲学目录学、法学目录学、社会学目录学、化学目录学……。科学知识总量在不断增加,随着科学总体系层次的加深,目录学分支也随之“微分化”。

其次,功能预测。目录学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目录学体系随着环境的需要而不断地调整内部结构,引起功能的变动。目录学体系具有动态的特征,因而其功能也是不断变化的。我国目录学从早期的学术之史到近代的“剖析源流、方便稽检”,直到今天的解决揭示报道文献与人们对文献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都在不断进行功能进化。未来目录学的功能将从情报对人的知识结构改变的角度,通过揭示科学创造的活动原理,可能找到比书目情报更接近人的思维认识的要素,在书目情报检索的基础上形成的自由文本检索也是发展的趋势之一。

再次,目录学发展趋势的预测。这是对整体的宏观预测。目录学体系探索目录学的发展规律、概念、原理、结构范畴之间的联系形式,使它能从整体上预测各部门的发展,从而预测整个目录学的发展趋势。

目录学体系的探索始终以目录学核心为起点。这是目录学体系预测目录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机理,中国目录学核心在古典目录学时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主,近代出现了对目录学核心研究的重新认识的倾向,杜定友、刘国钧等“新目录学家”主张目录学为簿计之学;姚名达等“新旧俱全”派主张“剖析源流,方便稽检”。七十年代末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要研究揭示和报道文献与人们对文献利用之间的矛盾和“文献记录与利用”之间的关系。

西方目录学从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目录学的核心是“图书的抄写”,十七世纪以来演变为“关于书的写作”,十九世纪时贺恩、福开森等仍然认为目录学是对“图书的记录”,二十世纪中叶以后,M·伊根、J·H·谢拉、B·C·布鲁克斯主张以知识交流的角度去作探索。

由此看来,目录学理论进化的机制是理论核心的演变。随着目录学知识交流的功能的增强,目录学的理论研究则着重注意书目情报的生产——传递——利用体系。目录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不是单一的,书目情报的交流,是核心的主干,在这个核心周围凝聚着目录学的其它知识。

不同学派目录学的核心具有自己的特色,中、西目录学核心有很大差异。中国目录学的特色是注重学术源流,推荐、教育的功能,西方目录学特色是重视文献的记录。中西目录学汇流,形成统一的科学体系,并结合不同的文化特征形成具有本国文化特色的目录学体系,这是目录学的发展方向。

注释:

① 福开森(英)著,耿靖民译,《目录学概论》,武昌文华图专,1934年。

② 彭斐章、乔好勤等著:《目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塔古等著,成瑛译:《指数增长率》,国外情报科学1983年第2期。

④ 黎锦熙著:《新目录学论丛》,湖南大学,1948年。

⑤ Hans H Wellish, The Cybernetics of Bibliographic Control, Journal of ASIS N.I 1980

⑥ 江藩:《师郑堂集》,无锡文苑阁本。

⑦ 王重民著:《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

⑧ 北大、武大编:《目录学概论》,中华书局1982年。

⑨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

⑩ 魏征:《隋书·经籍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

⑪ 郑樵:《通志·校雠略》,商务印书馆,1935年。